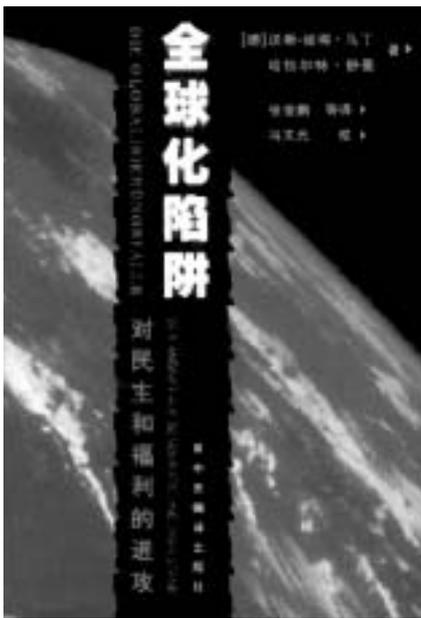


二比八的社會

——從《全球化陷阱》一書說起

• 梁 曉



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著，張世鵬等譯，馮文光校：《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在下一個世紀，啟用有勞動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德國《明鏡》(Der Spiegel) 雜誌的著名記者馬丁和舒曼，在他們合著的世界暢銷書《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的第一章，開門見山地引述了「全球智囊團」中的實用主義精英們對未來的結論^①。

其餘的人怎麼辦？富有的20%居民，如何能夠關心剩下的「多餘無用」的居民？在全球競爭壓力下，無法指望公司企業會熱情投入此事，失敗者只能從鄰里救濟會、體育運動企業或所有各種社團組織那裏獲得慈善捐贈。也就是說，只有讓被排擠出局的人「靠餵奶過日子」，才能使其安定下來。不幸的是，各國政府盲目地要適應世界市場壓力，只能應跨國公司要求削減福利。這會把現存的福利社會引入無法無天的社會反常狀態，使正常運轉的現有社會結構崩潰。在社會地位

「全球智囊團」中的實用主義精英們預測：「在下一個世紀，啟用有勞動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富有的20%居民，如何能夠關心剩下的「多餘無用」的居民？原來備受推崇的「全球一體化神話」，是怎麼演變成一個「陷阱」的呢？

降低和受社會排斥的人中，少數極端份子的隊伍正在擴大，而對於這些人的激進化所產生的破壞力，市場和跨國公司都沒有辦法對付。一旦出現極端情況，束手無策的政治家們為爭取選票，又可能反過來採用「急剎車」的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挑起貿易戰、貨幣貶值戰，從而導致各國的經濟混亂和福利損失。

然而，原來備受推崇的「全球一體化神話」，是怎麼演變成這樣一個「陷阱」的呢？作者以相當充實的材料和數據，描述了這樣一件帶有巨大爆炸力和爭議性的大事。

一 全球化的衝擊

首先，通訊和媒體的全球化發展，為經濟全球化鋪平了道路，也將同樣的問題帶到了世界各國。500多個人造衛星，用現代無線電信號覆蓋了地球。呼籲「要把一切變得輕鬆、快捷和簡單」的媒體王國迪斯尼公司，在「全球文化殖民化」方面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澳大利亞的默多克公司，向居住着世界二分之一人口的四個時區發射衛星電視節目信號。亞特蘭大的奧運會開幕式，至少有35億電視觀眾同時觀看，這是本世紀聯結世界的電視網絡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在1995年，已經有9,000萬人定期使用覆蓋全世界的國際互聯網絡，每周大約增加50萬人。電子通訊網、數控衛星電話、高效率的飛機場、免稅的工業園區，所有這些織成的密集網絡，將使大約30多個遍布全球的大城市地區彼此緊密聯繫在一起。人類今天

必須與一種世界性生活方式相協調一致。

自70年代初以來，金融全球化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場的神聖經濟學說的名義，系統地拆毀了用以控制和掌握貨幣與資本跨境流通的一切限制。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極其清楚地顯示出全球經濟一體化如何改變了世界權力結構和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在這一次危機中發生作用的各種因素似乎被看不見的手所操縱，超級大國美國政府、一度無所不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所有歐洲國家的貨幣發行銀行，都不得不服從一個具有無可估量的摧毀力的更高權力，這就是國際金融市場^②。以下數據對這一點作了補充說明：1985-95年，外匯與國際有價證券交易的營業額增加了十倍，平均一個交易日交換的貨幣總量大約1.5萬億美元，這幾乎是世界各國發行貨幣銀行全部外匯儲備的兩倍以上。此外，還有七萬多種有價證券正在進行跨國的自由交易。1989-95年，所有兩年期的期貨合同的名義價值翻了一倍，在世界範圍內達到了無法想像的龐大數目：410,000億美元。在這些交易中，只有2-3%直接用於保障工業和商業的活動。這是一個擁有無限機會和無限風險的夢幻般的市場。這樣一種機制，首先使大銀行財源廣茂、生意興隆，同時，所有匯率的波動幅度急劇擴大。全球化的結果是：個別國家施加影響的能力日趨微小，國際炒家的能量在金融等領域日益擴大，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有了資本和勞動力選擇的全球

跨國公司的強大力量，表現在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將近14,000億美元的年銷售額；跨國公司佔有全世界貿易的2/3。它們是全球一體化的核心，並且一往無前地推動着這個過程。

化，涉及所有領域的跨國公司可以同樣地剝奪國家的行動能力。在一種全球的鉗型運動中，新的資本國際有時在這裏、有時在那裏，以抽走資本相威脅，迫使政府大幅度減稅、提供巨額補貼和無償的基礎設施。跨國公司的強大力量，表現在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將近14,000億美元的年銷售額；跨國公司佔有全世界貿易的2/3。在這種交換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公司自己的網絡系統內完成的。它們是全球一體化的核心，並且一往無前地推動着這個過程。

為提高競爭力，不光是傳統的工業跨國公司，銀行、電信、航空和保險業等重要的服務性部門，都正在或準備進行大規模兼併和減薪裁員^③。美國電信業重組，每次總是兩家地區性公司一瞬間就聯合成一個更大的單位，同時員工被裁減，美國電報電話公司還宣布要進一步裁減四萬個工作崗位。英國電信公司早在1984年私有化時已經裁減了幾乎一半員工——13,000人，但是，計劃到2000年還要削減36,000人。1991-95年，IBM公司把工資開支削減了1/3，並解僱了122,000人。1995年，美國全體男性職工中，有4/5的人每一工作小時的實際收入要比1973年減少了11%。德國公司只在勞動力低廉的國外創造新的勞動崗位。今後幾年裏，歐盟各國可能有1,500萬就業者保不住目前的全日工作，而1996年已經有幾乎同樣數目的人失業。在一種殘酷的全球化經濟中，競爭將造成全球性的勞動市場，再沒有任何一種職業是有保證的了。

二 「全球化陷阱」的特點

1、**極端的不平等**。世界上1/5的最富有國家決定着全世界84.7%的社會總生產，它們的公民從事的貿易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84.2%，佔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85.5%。發展中國家的債務不斷增加，1996年上升到1.94兆美元，是十年前的兩倍。358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總計25億人（即幾乎世界一半居民）的所有財產。世界上20%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費的木材，相當於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們還消耗着世界金屬加工總量的75%，能源的70%。生態困境進一步推動了即將來臨的「二比八的社會」，因為只有少數人才有能力享受緊張而昂貴的自然財富，只有支配它們的人才能獲得附加利潤。

2、**勞動力價格的螺旋形下降和中產階級的衰落**。在世界範圍內，工薪人員的薪金在社會財富中所佔比例都在下降，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單獨對抗這種壓力。爭奪世界（勞動）市場份額的無限制的競爭，使勞動力循着螺旋曲線愈來愈快地貶值，某個更廉價的競爭對手總是已經在場或者很快會到場。自我「調整」的結果只是迫使其他地方的競爭者重新調整，並且很快就又輪到自己需要重新調整。絕大多數僱員無論怎樣努力，在這場競賽中都只會輸，受益的只有少數富人和某些具有高技能的人——在老牌工業國家中這部分人平均佔人口的1/5。在這種向「二比八的社會」發展的趨勢中，收入統計清楚地顯示了貧富之間愈來愈深的鴻溝。

目前，世界上1/5的最富有國家決定着全世界84.7%的社會總生產，它們的公民從事的貿易額佔世界貿易總額的84.2%，佔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85.5%。生態困境將進一步推動「二比八的社會」的來臨，因為只有少數人才有能力享受緊張而昂貴的自然財富，只有支配它們的人才能獲得附加利潤。

資本流動愈來愈自由導致的各國之間金融經濟的「短路」，迫使各國政府爭先恐後地放寬政策：減少徵稅、提供數十億的補貼、或者無償提供基礎設施。誰能夠為（資本的）強者創造良好條件，誰就會受到獎勵；而誰對資本流動製造的「摩擦」大，誰就會受到懲罰。

建立一個讓盡可能廣泛的中產階級共同致富的富裕國民經濟的設想會被拋棄，隨之而來的是日益嚴重的社會瓦解。至少有1/4的德國居民已經告別了富裕，中間階層的下層正逐漸貧困化。未來十年內，德國的中級行政管理機構中，大約有一半人會失業。億萬富翁正忙於在他們公司的中層管理人員提出養老金要求之前，就把他們解僱。美國的中產階級也正在衰落乃至瓦解，年輕一代根本負擔不起父輩的生活方式。1,820萬辦公室工作人員中，有數百萬人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會被計算機取代。如此發展下去，對社會構成威脅的，並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貧困者，而是那些中產階層。由於他們恐懼社會地位的喪失，會引發無法預料的政治爆炸力。因此，並不是貧困，而是對貧困的恐懼正在威脅着民主。

3、社會福利的調節能力減弱。過去，累進所得稅和國家自上而下的再分配，可以對社會不平等進行限制，這是社會穩態形成的基礎。現在，國家的「統治者們」——從跨國公司老闆到勞動部長，都只知道要求公民們放棄福利。削減患病期間繼續支付的工資；廢除阻止解僱的保護性法令；儘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還是要大幅度削減所有社會福利和降低工資。工業時代與它的大規模福利一起，將作為經濟史的短暫瞬間而不復存在。其實，德國國內的社會福利負擔絕對沒有爆炸性地增長，1995年它在全部社會生產中所佔比例比二十年前還要低。但是，削減國家開支、降低工資、取消社會福利，這個綱領都成

為各國政府政策的核心，而抗議活動到處都在無可奈何中結束。

4、政府職能被削弱。一方面，資本流動愈來愈自由導致的各國之間金融經濟的「短路」，迫使各國政府爭先恐後地放寬政策：減少徵稅、提供數十億的補貼、或者無償提供基礎設施。誰能夠為（資本的）強者創造良好條件，誰就會受到獎勵；而誰對資本流動製造的「摩擦」大，誰就會受到懲罰——資本轉而流入其他地方，潛在的就業機會減少。在英國和美國，政府早就主動地開始減少國家對經濟自由化的干預。不再是由民主選舉的政府來決定稅率的高低，而是由資本流和商品流的決策者來決定他們對國家任務的實現應作出的貢獻。這種政策取向的背後，是降低國家福利開支和放棄社會福利平衡，其結果只能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

另一方面，各個逃稅天堂吸引的外逃資金，國家也無法進行干預和監管。據估計，所有海外分支機構旗下管理的資金總計二萬億美元。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各跨國公司在稅法的灰色地帶中活動，使對收入的徵稅額輕而易舉地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所有資金外逃的地點加起來計算，保守估計德國政府每年稅收損失高達500億馬克，接近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債務。

三 簡 評

《全球化陷阱》一書的作者，以記者特有的敏銳眼光和豐富閱歷去

發現和闡述問題。他們的寫作態度非常嚴謹，講問題時既不文過飾非，也不誇大其詞、嘩眾取寵。特別是採用的資料豐富而翔實，還有很多第一手資料，這正是其他同類研究著作所缺乏的。然而，由於作者的職業、所處環境和研究出發點的限制，使該書存在不少缺陷，值得注意：

1、提出的解決辦法近於空想。作者認為，要「和平地」走出困境，可以通過實施一些「反向戰略」來實現：反向戰略的核心是提高勞動的價值；借助徵稅來逐步和長期地提高能源消費的價格，既遏制危險的環境污染，又可以在此過程中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並延緩自動化工藝的使用；提高運輸費用可以限制跨國的勞動分工；在社會其他領域，如在衛生保健部門中、在大學和中小學裏、在恢復遭到破壞的農業區或重建衰敗的衛星城的過程中，都有不少就業機會；最重要的是，國家必須限制金融市場上當事人的政治權力，並取得必要的收入，例如可以對跨國的資本流動徵稅，等等。為此，作者寄希望於歐洲。

然而，在當今資本和勞動力全球化選擇的大潮衝擊下，即使能說服大多數國家採取上述「增加摩擦」的措施，資本也會流向少數摩擦小的國家而使其受益。所有國家都具有「共同行動能力」嗎？能公平和公正地維持所有國家的競爭環境的「世界警察」會出現嗎？如果沒有，各國只能「各人自掃門前雪」，那麼以上方法恐怕只能是典型的空想。

2、缺乏對發展中國家的較深入分析。作者身處發達國家德國，因此也自然而然地從發達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即使有不少篇幅談到發展中國家，着重的也是它們與發達國家的競爭關係，它們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和對全球環境的影響等等。其中對亞洲發展中國家就談得更少、更淺。實際上，亞洲國家已經在世界經濟中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遠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所估計的更深遠。雖然亞洲發展中國家還沒有進入福利社會，但是，因全球化破壞了原來的社會結構而引致的社會危機，遠比發達國家要來得早，而且破壞力更大。印度尼西亞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要求繼續開放和自由化後，此起彼伏地出現暴亂和政治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④。另外，在危急形勢下，為維護本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會比發達國家更堅決地採取與全球化、自由化相反的策略。最突出的是馬來西亞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後來還實施了外匯管制。因此說，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研究，總是存有缺陷。

3、整個分析只停留在經濟學層面。從全書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很好的經濟學基礎和對經濟問題的理解力。然而，全球化牽涉到的不僅僅是經濟學問題，特別是考慮到全球化對福利和民主的影響時，許多問題是純經濟學理論很難解釋的。這裏需要系統的社會學、政治學理論作為分析基礎。缺乏這一基礎，作者就只能在經濟學層面上

《全球化陷阱》一書的作者身處發達國家德國，因此也自然而然地從發達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即使有不少篇幅談到發展中國家，着重的也是它們與發達國家的競爭關係。其中對亞洲發展中國家就談得更少、更淺。實際上，亞洲國家已經在世界經濟中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比西方發達國家的領導人所估計的更深遠。

全球化牽涉到的不僅是經濟學問題，特別是考慮到全球化對福利和民主的影響時，許多問題是需要系統的社會學、政治學理論作為分析基礎的。由於作者缺乏這些基礎，就只能在經濟學層面上對福利和民主問題「點到即止」，也就更談不上提供甚麼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了。

對福利和民主問題「點到即止」，也就更談不上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了。

無論如何，能尖銳而深刻地提出問題，這本身已經很難能可貴。這本被譯為世界二十多種文字出版的書，值得向那些想對「全球化」作更全面和深入了解的讀者推薦。

4、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的分析——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1997年中從亞洲開始並蔓延全球的金融風暴，引發了許多比《全球化陷阱》中所描述的影響更深遠、範圍更廣泛的問題^⑤。越來越多人揭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美麗面紗，去正視其真正後果。對於這麼一個熱點，我們以往的研究曾得出與《全球化陷阱》一書十分相似結論^⑥。與《全球化陷阱》不同的是，我們研究的關注點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家民族利益得失。

我們認為，縱觀近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始終有一個生產力發展超越國界和世界市場以民族國家為單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經濟、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以後的冷戰，在經濟層面，本質上都是這個矛盾的反映。試想，各國都關起門來，在國界內部按照百萬、千萬的人口規模生產自己的汽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年生產近千萬輛汽車，若只能在美國賣，那麼怎麼可能呢？一個世紀以前，馬克思曾經血淋淋地詳細描述英國機織紡織品對印度和中國小農經濟的摧殘。在這個意義上，說瓦特蒸汽機演化出資本主義全球殖民的歷史，並不牽強附會。同理，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正是持續

半個世紀的冷戰，把世界市場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跨國要求，集中成為可以跨國分工和相對自由貿易的兩大板塊，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秩序基礎。

如今，第三世界生產力的供給能力發展起來。生產力的發展，以信息產業為龍頭，發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飛躍。為了適應這個生產力的發展，早在80年代，以洲為單位以至跨洲的地區經濟貿易結盟就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冷戰一結束，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就在貿易、直接投資、開放電訊、媒體、商業、金融市場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來。如果說生產力的發展與殖民、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世界大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世界秩序演進，並存在某種相輔相成的內在聯繫，那麼今天，技術進步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更是以百萬、千萬甚至上億人口規模為單元的國家所無法容納的了。在這個問題上，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四個強國聯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車，與美國航空工業一搏，是超越國界的生產力發展在供給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韓以幾千萬人口的國力和市場規模，獨立發展各種產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是超越國界的生產力發展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說明。

生產力發展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絲毫不意味着正義和公平。像以往的歷史一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融合了少數生產力發達國家自私的國家利益。譬如，冷戰

結束以後，美國的軍工重組直接威脅歐洲以國家為單位的軍工產業的生存^⑦。譬如，醞釀許久的歐元，說到底，也不過是歐盟列強團結起來，既抗衡美國，又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盡量攫取最大份額的工具。譬如，就像當年英國的機織紡織品是用炮艦送來的一樣，今天，專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國際游資四處橫行作孽，絕大部分集中在美國的幾家金融機構^⑧。亞洲金融危機以後，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各地受災政府進一步自由化改革開放。雪上加霜的結果，迫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和地區不得不奮起保護自己。馬來西亞的外匯管制，台灣禁止索羅斯（George Soros）進場，香港當局與國際炒家「埋身肉搏」，中國的人民幣不貶值和暫不考慮人民幣可兌換的改革等等，都是國家民族利益與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摻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從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匯管制開始，金融危機迫使所有政府大大加強干預和控制本國經濟的行為。相對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將《全球化陷阱》一書的觀點，再往下引伸一步，是不是可以得到這個結論呢？

註釋

① 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合著，張世鵬等譯，馮文光校：《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北京：中央編譯

出版社，1998）。本文所採用的材料和數據，除特別注明外，均引自此書。

② 應該說，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更生動和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

③ 進入90年代，全球每年的收購兼併金額不斷上升，1998年更達到24,000億美元，全球歷史上十次最大的兼併事件，有九件發生在1998年，而且幾乎都集中在電信、銀行和石油等戰略產業（見Peter Martin, “Gorging on mergers”, *Financial Times*, 22 December 1998, 15）。

④ 詳見梁曉：〈印度尼西亞形勢分析〉，《參閱文稿》，No. 98-11，1998年8月。

⑤⑥ 參見王小強、梁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國時代〉，《香港傳真》，No. 98-55，1998年10月17日。

⑦ 參見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⑧ 衍生工具市場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高度集中，而且越發展越集中。1993年年底，美國美林、所羅門兄弟、摩根銀行、摩根士丹利、高盛和信孚六家，就佔全球衍生工具合約的40%。到1996年國際結算銀行調查時，美國14家金融機構佔了美國全國衍生工具活動的90%。英國396家銀行參加衍生工具的交易，其中22-25家佔去交易量的90%以上（參見王小強：〈聯繫匯率的邏輯理解〉，《香港傳真》，No. 97-8，1997年11月8日）。

生產力發展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絲毫不意味着正義和公平。像以往的歷史一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融合了少數生產力發達國家自私的國家利益，因而迫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和地區不得不奮起保護自己。

梁 曉 廣州中山大學經濟學碩士，現任香港粵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研究部研究助理。